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INTEREST GROUPS AND TRADE POLICY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

G.M. 格罗斯曼

Gene M. Grossman

E. 赫尔普曼

Elhanan Helpman

著

李增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INTEREST GROUPS
AND
TRADE POLICY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

G.M. 格罗斯曼
Gene M. Grossman / 著
E. 赫尔普曼
Elhanan Helpman
李增刚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格罗斯曼, 赫尔普曼著; 李增刚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ISBN 7-300-06574-0

I. 利…

II. ①格…②赫…③李…

III. 政治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研究

IV. ①D564②F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7218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

G. M. 格罗斯曼 (Gene M. Grossman) 著

E. 赫尔普曼 (Elhanan Helpman)

李增刚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239 (出版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1 插页 2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1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炼，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



经济学到了 20 世纪才真正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 20 世纪，经济学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容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在这两个主要的领域不断地深耕密植。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日益精细完美。经济学家们还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主干之上发展出了许多经济学的分支，比如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等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学的范式，细致的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的收益。这正是经济学能够以加速度迅猛发展的原因。



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英雄气短，在这个美仑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

然而，21世纪悄然降临。经济学工匠向窗外望去，发现在更高的山冈上，已经矗立起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神殿的脚手架。我们的选择在于：是继续在20世纪的经济学殿堂里雕梁画栋，还是到21世纪经济学的工地上添砖加瓦。

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21世纪的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20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21世纪将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讲到，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21世纪的经济学将从纸上谈兵转变为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现象。炉火纯青的分析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感觉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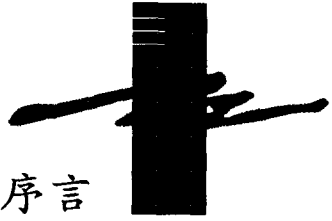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所翻译的主要是处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20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21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如果不惮“以偏概全”的指责，我们可以大致举出21世纪经济学的若干演进方向：博弈论将几

乎全面地改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将日益动态化；政治经济分析尝试用经济学的逻辑对复杂的政策决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把握；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将“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平等、道德等伦理学的讨论也将重新进入经济学。

介绍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追踪国外经济学的前沿。追赶者易于蜕变成追随者，盲目的追随易于失去自己的方向。经济学是济世之学，它必将回归于现实。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创新，坚持终极关怀的学者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代宗师。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也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并不是出于赶超的豪言或是追星的时髦。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世纪之交，经济学的发展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放。这恰恰契合了中国的当前境况。我们借鉴的不仅仅是别人已经成型的理论，我们想要从中体会的正是这种思想的活跃和开放。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留学海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参与了这套译丛的推荐、翻译工作，这套译丛的选题是开放式的，我们真诚地欢迎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关注这套丛书的同时，能给予它更多的支持，把优秀的经济学学术著作推荐给我们。

译者序言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Interest Groups and Trade Policy) 收集了格罗斯曼 (Gene M. Grossman) 和 赫尔普曼 (Elhanan Helpman)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 8 篇论文: 前 3 篇主要讲述了利益集团影响政策制定所使用的工具, 后 5 篇则是这些工具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运用, 代表了内生贸易政策 (endogenous trade policy) 理论的最新发展。在这篇序言中, 笔者首先简单介绍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生平与主要著作; 然



后回顾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形成的文献，即内生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进程，以彰显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理论的突出地位。

一、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是当前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代表，与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一起被称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

（一）生平

格罗斯曼 1955 年 12 月 11 日生于美国纽约。1973—1976 年在耶鲁大学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76—1980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 1980 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先后担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等职务；从 1992 年开始，担任雅克布·瓦伊纳国际经济学教授。从 1981 年开始，他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他还是《经济学季刊》、《国际经济评论》、《国际经济学杂志》、《经济展望》等杂志的副主编，多个研究机构如经合组织（OECD）、世界银行等的顾问。从 1978 到 2002 年，格罗斯曼共发表各种文章 70 多篇，出版专著 4 部，主编著作 7 部。

赫尔普曼 1946 年 3 月 30 日生于前苏联的 Dzalabad，1957 年移居以色列并加入该国国籍。1966—1971 年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学习经济学和统计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71—1974 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 1974 年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从 1981 年起担任经济系主任和多个研究所的所长；从 1986 年开始，赫尔普曼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加拿大高级研究所等担任研究员；1997 年开始，赫尔普曼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2002 年成为国际贸易 Galen L. Stone 教授。从 1976 年开始，赫尔普曼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罗切斯特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目前，

他担任特拉维夫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且主要致力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金融、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研究。从1974年到2002年共发表各种文章120多篇，出版专著6部，主编著作8部。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从1989年开始合作发表文章，到2002年底，两人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有23篇，合作出版专著3部。他们在进行合作之前，都已经在合作领域做出过一定贡献。赫尔普曼从1974年开始发表论文，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几本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著作奠定了其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地位；格罗斯曼从1978年开始发表关于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等的论文，也奠定了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将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产品多样化等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从其理论基础上看，他们与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克鲁格曼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一脉相承。

（二）赫尔普曼早期的成就及其与克鲁格曼的合作

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研究一般均衡以及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福利分析问题。80年代之后，赫尔普曼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理论方面都有所贡献。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他主要集中于垄断竞争、递增收益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虽然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不是由赫尔普曼做出的，但他却为这个领域的充实、发展、完善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有《产品多样性、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张伯伦—赫克谢尔—俄林方法》、《可变规模收益与国际贸易：两个一般化结论》、《递增收益、垄断竞争和要素流动：福利分析》、《递增收益、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等。他与克鲁格曼合作出版的《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和《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①更是奠定了其重要地位。《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被称为国际贸

^① Helpman, Elhanan, and Krugman, Paul. 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5;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9.



易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是“我们每个人的书房里都需要的里程碑式的书”^①。在这本书中，他们对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研究，重新回答了贸易理论的两个古典问题：国际贸易的模式是由什么决定的？国际贸易是否有益？他们的结论为：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国家间贸易的主要原因，但不是惟一原因；即使在各国嗜好、技术和要素禀赋完全相同时，规模经济也可以导致对外贸易。国际贸易潜在的额外得益有四个原因：本身的生产效应、生产集中、合理化和多样化。《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可以看作《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的姊妹篇。如果说后者侧重于贸易理论的实际方面，前者则侧重于国际贸易规范方面的研究。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明确指出，该书是要对不完全竞争市场中贸易政策影响的模型作系统回顾。他们分析了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的贸易保护，如关税、配额、战略性出口和进口政策等内容。

（三）格罗斯曼的早期成就

格罗斯曼早期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政策的福利分析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等的研究，如《跨境税收调整：它们歪曲了贸易吗？》、《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战略性贸易政策：问题回顾与早期分析》、《寡头垄断下的最优贸易和产业政策》等。

从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成就看，他们都与克鲁格曼有一定关系。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共同出版了两部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著作；而克鲁格曼作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格罗斯曼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人的合作研究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都对增长和技术进步、研发等问题产生了兴趣，这奠定了两人合作的基础。此后，两人

^① 上述评价是由迪克西特、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给出的。参考该书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译者的话”，6页。

的主要成果几乎都是在合作中完成的。他们的合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贸易、技术进步与增长领域；第二阶段主要是在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领域。

1990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合作发表《贸易、创新与增长》，开始了他们第一阶段的合作。此后，二人合作发表了《比较利益与长期增长》、《增长理论中的质量阶梯》、《贸易、知识外溢与增长》、《质量阶梯与生产循环》、《增长理论中的内生创新》等一系列论文。后来，他们共同出版了《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他们在该书前言中指出，他们试图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假设新技术源于经济决策者面对市场诱因做出的理性行为，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中，这些市场诱因必然反映国际贸易的一个方面，而他们可以在讨论经济增长时关心技术进步的经济决定因素；在讨论国际贸易理论时侧重比较优势的动态演进以及全球技术竞争背景下的国际贸易。这样，他们将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存在下的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结合了起来。

从1994年开始，两人在国际贸易政策领域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文，对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选择的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的论文有：《保护待售》、《贸易战与贸易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政治学》、《选举竞争与特殊利益政治学》、《内生保护下的对外投资》、《共同代理与合作：一般理论及其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运用》、《竞争赞同》等。

在研究贸易政策选择的过程中，他们对利益集团影响政策选择的逻辑发生了兴趣。他们试图找出利益集团影响政策选择的一般理论，这就是《特殊利益政治学》一书要解决的问题。这本书荣获美国政治学会政治经济学分会的“政治经济学威廉·里克（William H. Riker）最佳图书奖”。在这本书中，他们有两个基本假定：（1）个人、集团和政党根据自身利益行事，并且他们的行为不存在系统错误；（2）政治结果可以等同于均衡的博弈论概念。均衡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政



治行为主体认识到他们如何在策略环境中行事以及预测到其他行为主体如何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反应；第二，在多阶段博弈中，行为主体具有前瞻性，并且认识到他们当前的选择会影响随后阶段博弈的条件和结果；第三，在参与者不具有完美信息的博弈中，他们运用对所观察到事物的一致解释更新自己的信念。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从简单到复杂的递进方法分析了：（1）直接民主制到代议制民主下的选民与选举问题，作为选民的利益集团的行动；（2）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利益集团，从无成本的简单游说到有成本游说，进而到向选民提供信息；（3）运动捐助、购买影响、竞争影响等问题。他们从经济学的简单假定出发，由浅入深地解释了民主制下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①

在这一时期，两人除了进行合作研究外，也分别在各自关注的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赫尔普曼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金融领域、研发、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如“汇率体系：新视角”、“债务减免下的税收信贷”、“内生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创新率的国际联系”、“创新、模仿与知识产权”、“国际研发溢出效应”等。格罗斯曼则主要集中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污染与增长”、“经济增长与环境”等。

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内生贸易理论的发展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这方面最早的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沙斯施奈德(Schattschneider, E.E.)的《政治学、压力和关税》^②。在这本书中，沙斯施奈德对利益集团在1929—1930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形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开创了研究美国利益

^① Grossman, Gene M., and Elhanan Helpman, *Special Interest Politics*, The MIT Press, 2001.

^② Schattschneider, E.E., *Politics, Pressures and the Tariff*,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5.

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先河。50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表“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①。他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可以从国家层次上的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的工具。沙斯施奈德和金德尔伯格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主要是借鉴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50—6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就有学者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就明确提出了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②到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之后，许多学者研究了贸易保护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按照马吉（Stephen Magee）的解释，从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出发，是内生贸易政策模型的主要特征^③。

（一）关税形成函数模型

在该模型中，游说集团恳求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政策。这类模型是由芬德利和威利兹（Findlay and Wellisz, 1982）、芬恩斯特和巴格瓦蒂（Feenstra and Bhagwati, 1982）几乎同时提出来的。二者的差别在于：在芬德利和威利兹模型中，他们假定利益集团的游说只使用“劳动”一种要素；在芬恩斯特和巴格瓦蒂模型中，利益集团游说使用的资源不仅仅是劳动，还有资本。他们假定，存在不变规

^① Kindleberger, C.P., "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9 No.1, Feb.1951, pp.30-46.

^② 塔洛克是在研究了关税造成的福利损失后提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政府一般不会自动地征收保护性关税，它必定是在一些集团（如国内的生产者）的游说或施加压力下才这样做，而这些政治活动是要耗费资源的；而另一些集团为了抵制关税导致的价格提高以及由此引起的财富转移，也会投入资源来阻止政府做出征收关税的决策。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67, 224-232.

^③ 马吉曾解释了“内生政策”的含义。他指出，“内生”（endogenous）的含义是“从内部成长”，“内生政策就是源于行为者追求狭隘自利的政策”。



模收益和完全竞争的两个部门，两个部门在生产过程中都运用可以流动的劳动力和部门专用性资本。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关税水平随着进口竞争产业的游说努力而不断提高，随着出口产业的游说努力而下降。在这个过程中，贸易政策是两个游说集团投入资源的函数，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策略的纳什均衡决定保护水平。

(二) 政治支持函数

希尔曼 (Arye L. Hillman) 借鉴斯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 1971) 和佩茨曼 (Sam Peltzman, 1976)^① 研究管制理论时提出的政府支持模型，研究了处于衰退的产业寻求贸易保护的问题。^② 他认为，政府对衰退产业的保护反应不是为了寻求社会福利目标，而是为了政治支持最大化的自利动机。政府虽然最终要对选民负责，但是消费者并不能够直接对价格做出政治上的反应，因为选举是一系列问题的结果，而且消费者组织起来影响价格和产业组织影响价格的交易成本相差悬殊。他提出，关税税率的选择可以看作一个最优化问题的解，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权衡从工业利益集团中获得的政治支持和由于消费者的不满而失去的选票。工业利益集团能够获得的利润越多，它们能够提供的捐献也就越多；而消费品价格越低，消费者就能够给政府越多的选票支持。因此，为了对某些衰退产业进行保护，提高关税水平，就会引起国内价格的上升，这虽然能够从工业利益集团中得到更多的支持，但从消费者那里得到的支持会下降。

① 斯蒂格勒的主要结论在于各种管制政策是政府为满足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制定的。后来，有人将斯蒂格勒的这种观点归纳为“俘虏理论”，即将政府看作利益集团的俘虏。Stigler, George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Spring 1971, No.2, pp.3-21. 中译文见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0~241页。Peltzman, Sam, "Towards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ugust 1976, pp.211-240. 在这两篇文章中，斯蒂格勒和佩茨曼暗含的假定是政府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

② Hillman, Arye, "Declining Industries and Political-Support Protectionist Mo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pp.1180-1187.

后来，朗和沃斯登（Long and Vousden, 1991）在一般均衡框架中对希尔曼的方法进行了模型化。他们假定存在两种产品经济，包括三个利益集团：两个产业专用性要素的所有者和可流动要素——即劳动——的所有者。他们运用政府的政治支持函数，包括三个集团的间接效用函数，以及每个集团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大小，即外生权重，反映了政府对三个集团的偏好。他们运用政府支持最大化的条件得出关税水平。他们的结论也证实了希尔曼的结论——衰退工业将继续衰退。

（三）政治竞争模型

马吉、布洛克（William A. Brock）等人很早就开始研究贸易保护政策形成中的政党竞争问题。他们假定存在两个政党，在选举前对关税政策持有不同态度：一个支持高关税；另一个支持自由贸易。两个政党的目标都是为了赢得选举。支持高关税的政党为了最大化当选的可能性，就会不断提高保护水平，直到它们能够从支持贸易保护的利益集团获得的选民和资源增加恰好等于失去的选民和资源。同时，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党会选择相反的主张，以使支持贸易保护的政党当选的可能性最小化。这样，它就会采取较低的关税，直到自由贸易者提供的选票和资源数量的边际增加恰好等于失去的选票和资源量。如果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党得到的捐献和选民支持较少，它也可能采取与另一个政党相同的政策。因此，每个政党做出自己的决策时，都会考虑对方政党的反应，其均衡结果就是古诺—纳什均衡解。

后来，马吉、布洛克和杨（Magee, Brock and Young, 1989）深化了这个分析，提出了正式模型（以下简称“MBY模型”）。他们同样假定存在两个政党，在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捐献之前就表明自己的政策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不影响其政策立场，而只影响不同政党当选的可能性。一个政党当选的可能性取决于自己和对方能够得到的捐献数量和双方的贸易政策，而能够得到的捐献数量又受到双方贸易政策的影响。因此，一个政党能够当选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双



方选择的贸易政策。假定不同的利益集团从不同的贸易政策中得到的收益不同，他们的目标就是最大化收益的期望值，它最终取决于不同政党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求解两个利益集团最大化期望收益和两个政党最大化当选的可能性的均衡解，就可以得出两个政党选择的贸易政策。假定存在一个支持贸易保护的游说集团，它通过捐献等游说政府提高关税，当游说的边际成本等于收益时，其捐献量达到最优水平。得到捐献的政党需要给利益集团以关税保护，当关税上升造成的扭曲效应减少的选票等于捐献增加赢得的选票时，政党提供的关税水平达到最优。

后来，希尔曼和厄斯普恩格（Hillman and Ursprung, 1988）在政治竞争中引入了外国利益集团的影响，扩展了MBY模型。他们认为，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一样，都通过运动捐献对候选人表达支持；候选人为了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化，也会对外国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做出反应。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作为贸易保护工具，关税可能会引起两国冲突，而自动出口限制则可能对双方是互利的。因此，如果自动出口限制是可行的，候选人一般不使用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工具。

（四）直接民主方法

迈耶（Wolfgang Mayer, 1984）在鲍德温模型、布洛克和马吉模型以及芬德利和威利兹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他指出，三个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关税水平反映了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以及其他贸易政策决策者的自我经济利益。他特别赞成鲍德温的模型，并以此作为自己模型的基础，甚至得出的结论也相同。迈耶首先以H-O-S模型为基础，分析了消费者偏好、要素分布和关税收益分配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的最优关税税率。他得出三个结论：（1）对进口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禀赋良好（较差）者的最优关税为正（负）；（2）个人与整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情况差别越大，他就追求与自由贸易相差越远的关税（或补贴）；（3）如果个人拥有的资